

博古知今

从考古资料看楚文化的影响

高崇文

楚国是周代极其重要的诸侯国。立国时虽国力弱小，“土不过同”，后来却成长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国力强盛时，西至巴蜀，东至大海，“地方五千里”。从不断积累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到，丰富灿烂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体现了楚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安徽武王墩大墓考古正在进行中，新的考古信息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新资料。我们对楚墓的了解，始于上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此墓多次被盗，出土青铜器近千件，有铭文者70余件，包括一大批楚王重器。因其位于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之郊，专家推测墓主应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1951年10月，考古学家夏鼐带队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清理发掘，发掘多座东周楚墓，第一次发现完整的楚墓棺槨和楚国竹简。此后又有河南信阳长台观楚墓、浙川下寺楚墓、湖北荆州江陵楚墓、楚郢都纪南城、当阳赵家湖楚墓、大冶铜绿山古矿业遗址等发现，楚文化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东周各国墓葬中，楚墓是发现最多的。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春秋至战国，楚墓墓葬形制有比较大的变化。春秋时期均为竖穴土坑墓，地表没有封土，墓坑内不设台阶，也无墓道。战国时期，虽还是竖穴土坑墓，但中等级以上的贵族墓都有封土。荆州楚郢都纪南城北纪山陵墓区，有许多大墓的封土直径40—100米、高6—10米。被推测为楚王墓的熊家冢陵墓西侧发现排列有序的车马坑40座，南侧发现殉葬墓92座。这类墓一般都有斜坡墓道，多数为一条，也有两条者，如可能是楚顷襄王墓的河南周口市马鞍山就设有两条墓道。战国时期的大中型贵族墓，墓坑壁往往设多级台阶，规模越大，墓坑越深，台阶越多。湖北荆州天星观楚墓有15级台阶，荆门包山二号墓、滕阳九连墩1、2号墓有14级台阶，荆州望山1号墓、藤店1号墓有5级台阶；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有7级台阶。小贵族墓有的也有1级或2级台阶或墓道，平民墓则无封土、台阶和墓道。武王墩一号墓的台阶数量为21级，是目前考古已知楚墓中最多的。

楚贵族墓的随葬品主要是铜礼器。按周制，天子用九鼎八簋，卿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楚墓基本应用此制度。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据著录可知，起首有大镬鼎2件、平底升鼎9件、带盖圆腹鼎24件，另外还有簋、鬲、甗、敦、豆、尊、壶、缶、盘、匜等，据此可知，该墓肯定有牢鼎数套，其最高规格应是九鼎八簋之制。浙川下寺二号墓，墓主是楚令尹，相当于卿。该墓两次被盗，现存的铜礼器有平底升鼎7件，即大宰七鼎之制。荆门包山二号墓，墓主为楚国左尹，其身份等级仅次于令尹。据所随葬的鼎数，应为大宰七鼎和少宰五鼎各一套。由此可以看出，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大背景，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礼制文明。礼制既是生活习俗，又是思想信仰，更是政治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一种礼制性的社会，凭借礼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礼制文化，具有向心性、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特质。

从考古资料看，西周时期，我国南方形成了几支不同的文化系统，江汉平原是楚文化，长沙一带是百越文化，汉淮间地区是汉阳诸姬（周王朝分封在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国）文化区，淮河流域是群舒文化区，江浙地区是吴越文化区，四川盆地及峡江地区是巴蜀文化区，岭南是南越文化区。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向四周扩张，楚文化不断统一着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对周边地区也有强烈影响。汉淮间诸国原本属于周文化系统，至春秋中期开始逐渐楚化，融入楚文化之中。淮河流域群舒文化至晚在春秋晚期也渐变成楚文化。长沙地区的百越文化到战国早期变成楚文化。战国时期楚文化对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对峡江地区及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都有强烈影响，峡江地区也属于楚文化范围了。

岭南两广地区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域，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秦汉时期，这里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变化。从墓葬形制看，基本上是椁内分箱的楚制。墓葬随葬品主要由三种文化系统的器物组成。一种是楚文化系统的器物，如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既有楚式铜鼎，还有仿楚式的陶鼎，一些中型墓中也多见楚式或仿楚式的鼎、壶、罍、盘等器物。另一种是秦汉文化系统的器物，如蒜头壶、扁壶、釜、釜盖、汉式鼎、纺、圆壶等，这类器物在岭南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几乎不见，而大量见于南北各地的秦汉墓中，属于典型的秦汉式器物。再就是本地传统的越文化系统器物，如越式鼎、各式各样的印纹硬陶器等。这种转变，应是秦汉大军南进时将两湖地区的楚文化迅速带入岭南所致。

楚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大运河考古展现多彩历史画卷

林留根



图为中国大运河遗产分布示意图。摘自《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2—2030)

漕渠是汉武帝为解决长安粮食问题在元光六年开凿的运河。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在漕渠基础上凿修成广通渠，“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10余年来的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考古，确定了汉唐昆明池的池岸线，进、出水口，发现了与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长期对峙。曹操为统一北方，开凿睢阳渠、白沟、利漕渠、平虏渠等运河，构成了黄河两岸重要的水路交通网；孙权开破岗渚，沟通秦淮河与太湖水系，占据江东；梁武帝凿上容渚，西晋惠帝开西兴运河。魏晋南北朝早期运河的开凿，为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成为隋唐大运河的先导工程。扬州隋炀帝墓、南京建康城遗址、长干里梁代国门遗址、镇江破岗渚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表明，江苏六朝至隋的早期运河体系为全国最早形成的较为完备的运河体系。

安徽省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通济渠宿州段、淮北段、商丘段、郑州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丰硕，对隋唐运河不同河段结构、河道演变以及文化遗存埋藏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首次在运河考古中发现利用自然河道拓宽通济渠的证据，实证了《隋书》中关于通济渠开凿的记载，完整地揭露河段并呈现运河开挖、使用、淤塞、清淤及废弃的全过程，确认了主、副航道的漕运模式以及“木岸狭河”河道工程设施。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永济渠(河北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开展永济渠(衡水段、邯郸段)考古勘探，确定了故城县永济渠故道唐宋武城遗址，进一步明晰了永济渠相关遗迹及故道在衡水、邯郸境内的保存及流径情况。

淮安板闸是大运河清江浦段上的五闸之一，为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平江伯陈瑄所设，以节制水流，便利通航。板闸自此开启繁华盛景，发展成为运河上的新兴城镇。板闸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此次发掘发现了水闸、古河道和建筑基址等遗迹，出土了3000余件器物，对于研究明清水利史、税收史及古代水利工程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聚落、城镇考古见证运河沿线繁华 运河聚落、市镇、城市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无锡泰伯渚遗址、淮安盱眙泗州城遗址

址和新路遗址、常州溧阳古县遗址、徐州地下古城遗址和下邳故城遗址的考古，见证了运河繁华，反映了运河主干线和支线交织的网络结构对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吴越地区是最早开凿运河的区域。江苏无锡发现的商周时期的梅里遗址，与泰伯渚和吴故水道关系密切。浙江绍兴亭山遗址群显示出越国山阴故水道的聚落景观，《越绝书》载：“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山阴故水道的开凿，便利了越国都城区域的东水西运交通，推动了越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为浙东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

溧阳古县遗址考古发现了城内干道和城外环城路网，揭露了南城门、东城门、西城门和城外的排水系统，周边发现水沟与水坝遗迹，显示出“开渚筑埭，垦种农桑”生产方式，确认为六朝“永平”“永世”县治所在，是与六朝早期运河系统具有密切关联的一座县城遗址。泗州城地处淮河下游、汴河之口，遗址总面积249万平方米，康熙年间沉没于洪泽湖水下。南京博物院主持的泗州城考古，发掘清理面积2.85万平方米，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城市格局、城市建筑具有重要价值。

盐业、手工业考古揭示运河成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脉络 盐业考古、手工业考古展现大运河沿线的手工业与盐业经济对中华文明兴盛发展的突出贡献。盐业考古是大运河考古的重要内容。西汉前期，吴王刘濞建都广陵(今扬州)，炼铜铸钱，伐木造船，煮海为盐，开凿了西通扬泰、东达海滨的运盐河。运盐河初期西接吴国的邗沟，东至海陵仓，被称为茱萸沟。2023年，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连云港、盐城发现了春秋、晚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盐业遗址90余处，发现与盐业生产中引蓄水、晒灰制卤、淋卤等相关的遗迹，印证了文献中“团煎法”的记载，填补了两淮盐业考古的空白，揭示了两淮盐业为推动中华文明兴盛发展与繁荣作出的突出贡献。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带来了运河沿线手工业、陶瓷业、造船业为主要产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及龙泉窑、安徽

10年前的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目前，全球共有500余条运河，其中6条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运河基本上都是在工业革命前后开凿的，唯有中国大运河是农业时代开凿的，是起源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古老中国的工程之河、交通之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河、精神长河。自7世纪以来，经历中国各个朝代，直到现代中国，大运河一直是维系经济政治统一的强大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它创造并维持了居住在运河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

大运河是一部工程技术、地理水文、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考古，则是打开这部书的方式之一。通过考古学的视角，可以看到一条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深沉博大的运河，一条历经沧桑桑田真实生动的运河。

据统计，我国大运河考古的文物点有400余个。新时代以来，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等运河九省(市)共开展200余项运河考古工作，60余项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7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6处。目前，由运河沿线省(市)24家考古文博单位联合推出的“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正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出，以庆祝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

运河考古展现了一幅幅绚烂的历史画卷，充分揭示了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对大运河的价值阐释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当下正在推进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考古也凸显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水道、水工遗存展现运河体系形成

运河河道本体与相关水工设施是运河遗产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所在。河北永济渠调查，安徽、河南通济渠考古与调查，陕西漕渠考古，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和板闸遗址、镇江铁瓮城西孙吴水道遗迹和京口闸遗址、仪征拦潮闸遗址、如皋隋唐掘沟遗址等实证了大运河遗产价值的科学性与真实性。